

国际政治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谈判与前景

于卫青

[摘要]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国际难民问题中的特殊问题,至今拖延未决。它因阿以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产生,但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可能得以解决。迄今,有关该问题的谈判经历了阿以谈判、巴以官方的正式谈判、巴以民间的非正式谈判三个阶段。在这些谈判历程中,显示出该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相关因素,暴露了该问题的难度和关键所在,也预示着最终达成协议所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巴勒斯坦;以色列;难民问题;和平谈判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5)06-0012-16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巴以关系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双方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曾有过的谈判历程与成果,无疑对最终协议的达成和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阿以谈判是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最初尝试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国际难民问题中的特殊问题。巴勒斯坦难民作为无国籍的难民,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权利,数十年来得不到相应的法律保障。巴勒斯坦难民散居在巴勒斯坦周围的几个阿拉伯国家,早已超出了阿以当事国范围,成为一个广泛的国际性问题。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着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就开始尝试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1. 约以谈判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1948年战争后,为解决难民问题,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于1949年春夏(洛桑会谈)和1951年秋冬(巴黎会谈)进行了讨论。由于双方的立场差距悬殊,结果不了了之。^[1]1949—1950年,约旦和以色列曾经进行了秘密谈判。当时,以色列外长夏里特向阿布杜拉国王表示:“美国有意提供大笔资金帮助阿拉伯国家安置难民,以色列也将出资帮助约旦安置难民,使安置难

民的过程与约旦经济发展过程相结合。”^[2]约旦认为:领土与难民问题直接相连,以色列或者要接纳更多的难民,或者须让出一部分土地。1950年初,约以秘密谈判被披露,阿拉伯世界一片哗然,谈判被迫终止。

2. 埃以谈判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的秘密调解下进行了间接谈判。埃及总统纳赛尔认为,以色列应该接受“难民有权自由选择返回以色列,还是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原则。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表示,以色列不能对难民的产生负责;遣返数十万阿拉伯难民会危及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有可能允许难民亲属团聚。纳赛尔示意可让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那些不愿返回以色列的难民的去所。后来,美国调解失败,这种间接谈判也终止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的10多年,阿以双方几乎没有接触和谈判。十月战争后,中东开始走上和解,埃及率先与以色列谈判。

埃及在戴维营谈判中提出:巴勒斯坦难民和外迁居民享有返回和接受补偿的权利。但是在双方签署的1978年戴维营协议中,只提及“在过渡阶段,埃及、以色列、约旦和自治机构的代表组成一个常设委员会,通过商定来决定接纳1967年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流亡出来的人的形式,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分裂和

混乱。埃及和以色列还将彼此合作并同其它有关方面合作,以为立即、公正和持久地实施难民问题的决议确定一些一致商定的程序。”^[3]

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前,阿以之间的有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阿以谈判中,由于缺乏当事者巴勒斯坦人的参与,难民问题往往不是谈判的主要内容,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巴以正式谈判是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关键

1991年,随着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正式谈判真正开始。经过多年时断时续的曲折谈判,虽然双方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2000年沙龙上台后,正式谈判随之中断。

1. 马德里和会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1991年10月30日,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参加了由美国和苏联发起的马德里和会。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多边工作组处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在会谈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重申了他们长期以来的立场。

巴方认为,以色列要承担难民问题产生的全部责任。巴方引用1948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194号决议第11节内容,要求以色列允许所有自愿回乡与犹太邻居和睦相处的难民尽可能返回,赔偿那些不愿回乡的难民的财产损失。巴方声称,194号决议给予了每一个难民及其后代返回因为战争而离开的原来土地的权利。他们称之为“返回权”。^[4]巴勒斯坦的强硬派甚至把返回权的确认基于以色列的非法建立和三个不争的事实:巴勒斯坦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和血统;巴勒斯坦人民与巴勒斯坦地域之间的地理和历史上的联系;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民族自决权。^[5]

以色列拒绝大量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内,拒绝承担难民问题的任何责任。以色列强调,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将破坏以色列国的犹太民族特征,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工党元老佩雷斯曾说,“如果接受这种要求(难民返乡),就将消除以色列国的民族特性,使犹太人从人口的多数变成少数。结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一要求不可能被接受。没有任何以色列政府会同意一项将破坏我们民族实体的战略。”^[6]以色列主张巴勒斯坦难民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就地安置。

1992年1月,由美国和俄罗斯发起,在莫斯科召开有关多边谈判的会议,决定成立难民等5个专门工作小组。难民小组会议只讨论改善难民生活的具体问题,政治问题由双边谈判去解决。1993年9月,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的秘密会谈获得突破,在华盛顿签署了原则宣言。巴以原则宣言确定了关于讨论难民问题的新架构,规定在巴勒斯坦自治过渡期内就包括难民、边界、耶路撒冷等最终地位问题进行直接谈判。难民工作小组则致力于改善难民营中难民的生活状况。到1996年5月,难民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

2. 巴以直接谈判与最终地位问题。1999年,巴拉克领导的工党上台,巴以最终地位谈判才真正开始。巴拉克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返回权”,但原则上同意一些难民可以返回巴自治机构控制的地区,将来更多的难民可以返回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仅限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70%,不包括耶路撒冷)。^[7]以色列政府也准备对巴勒斯坦难民予以一定的赔偿。

巴方坚持,以色列必须承认难民问题产生的道义责任,并在原则上接受“返回权”。如果以色列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就应该对难民的损失进行全面赔偿。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全部,以包括圣殿山的东耶路撒冷为首都。^[8]巴勒斯坦领导层在难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会谈没有进展。

3. 美国介入的戴维营会谈。2000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促成了巴、以、美三方首脑会谈。巴拉克表示在领土问题上可以做出更大的让步。在难民问题上,巴拉克拒绝承担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的任何道义或法律责任。但他同意以色列对难民的苦难表示遗憾,在家庭团聚的计划中吸收数万难民,向负责管理难民在以色列境外重新定居的国际机构提供财政捐助。巴勒斯坦方面没有回应以色列方面的让步,立场强硬。结果,68%的巴勒斯坦人认为阿拉法特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以色列国内有57%的人认为巴拉克对巴勒斯坦人让步太多。^[9]戴维营会议失败后,巴拉克政府仍然准备在领土和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最大程度的妥协,以换取巴勒斯坦在难民返回权问题上的让步。但是,巴方声称这个问题是不可谈判的。阿拉法特担心失去难民的支持而立场强硬,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4. 最后冲刺的塔巴谈判。

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但谈判没有终止。克林顿在卸任前竭力促使巴以达成最终协议。他在难民问题上建议:难民的返回权限于返回他们的祖国,即将来的巴勒斯坦国。不返回巴勒斯

坦的难民有权选择: 在他当前所在的居住地重新安置; 重新定居到其他国家; 在家庭团聚的范围内返回以色列境内的特定地区。一个负责难民重新安置的新国际机构将建立起来, 作为向难民提供的部分赔偿, 以色列将向该机构提供捐助。^[10] 克林顿公布他的这些建议后, 巴拉克声明, 如果阿拉法特接受, 他也准备接受。12月28日, 以色列政府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只是在安全条款和圣殿山问题上表示保留。巴勒斯坦方面拖延到2001年1月3日才回应克林顿建议。他们发布了一项表达立场的文件, 强调以色列承认返回权和难民有权选择他们永久定居的地点是结束巴以冲突的前提。这是美以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美国官方从此开始质疑阿拉法特的和平诚意。

2001年1月21日, 巴以在克林顿建议的基础上举行塔巴谈判。巴方立场更加强硬: 以色列不仅要承担难民问题的道义和法律责任, 而且应承担没有按照联合国194号决议达成解决方案的责任。以色列应该接纳那些自愿返回到以色列和邻居和睦相处的难民。以色列应该毫无例外地赔偿所有难民, 因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财产, 作为难民遭受了苦难; 以色列应该给未来的巴勒斯坦国进行集体赔偿, 因为以色列政府占用了公共的土地和建筑物; 以色列应该向收容难民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赔偿, 因为这些国家收容难民长达半个多世纪, 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执行和管理难民的遣返和赔偿, 应该建立新的国际机构。^[11]

以色列司法部长、代表团团长贝林提出了“个人回应”的非正式文件: 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和损失表示悲哀, 答应为结束这种悲剧扮演积极的角色。以色列在未来的几年内按家庭团聚的计划吸收数万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不限制在巴勒斯坦国内安置难民的数量。巴勒斯坦难民可以有三种选择: 在现在他们居住的国家重新定居; 移居到其他国家; 安置在以色列境内的根据领土协议转移给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 管理对难民的赔偿和赔偿的支付, 并为难民的重新定居而投资公共工程。以色列将是这一机构的最主要的捐助者。吸收难民定居的阿拉伯国家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贝林提议, 这些原则的执行应该被理解为完全、最终地遵从了联合国194号决议。在这些得以执行后, 当事方不应在难民问题上再有新的要求。^[12] 贝林的提议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 但巴方不为所动。塔巴会谈无果而终。以色列舆论批评贝林的“非正式文件”, “它打开了以色列面对无法控制的难民返回的大门。它似乎使以色列自身

接受了巴勒斯坦人返回权”。^[13] 贝林却认为: “我确信, 即使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 巴以也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们在塔巴非常接近达成一个解决方案, 在以色列不接受难民无限制地返回以色列的情况下, 双方可以达成一个公正的协议。巴勒斯坦领导人开始清楚表明, 他们不会竭力要求执行难民返回权。”^[14] 随着右翼的沙龙在大选中获胜并登上总理宝座, 历时10年的正式谈判也终止了。多年的谈判历程反映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自身的复杂性、艰巨性, 与领土、耶路撒冷等问题的连带性。以色列作为“施与”的一方, 立场主动而灵活; 巴方迫于内外压力, 不能断然有所取舍, 立场强硬而固执。这使以色列工党执政期间, 致力于以土地换和平的努力功亏一篑。同时, 这还证明, 难民的返回权问题事关巴以双方的核心价值, 将是制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解决的瓶颈。^[15]

三、巴以非正式谈判的成果和启示

沙龙上台后, 巴以陷入自杀袭击和定点清除的恶斗中, 中东和平的前景渺茫, 但爱好和平的人士没有放弃希望。2003年12月1日, 以色列前司法部长贝林和巴勒斯坦前新闻部长拉布为首的巴以民间人士, 经过两年多的秘密谈判, 在日内瓦签署了非官方的《日内瓦协议》。该协议本质上是先前巴以谈判的延续。贝林和拉布曾经是谈判桌上的对手, 也最了解巴以谈判的症结。日内瓦协议在导言中确认中东和平进程以来达成的协议和取得的成果, 重申了对联合国安理会242号、338号和1397号决议的承诺和执行, 宣称与布什的2002年6月24日的讲话、中东和平路线图和2002年3月阿拉伯联盟的贝鲁特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16]

日内瓦协议继承了2001年塔巴会谈的成果, 把联合国194号决议和难民问题的全面解决联系起来, 避免将来有人援引联合国194号决议重提“返回权”。因此, 在协议签署者看来, 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没有允许难民基于传统概念的“返回权”而返回到以色列。^[17] 日内瓦协议把以色列视为接受难民的国家之一。难民自己没有权利决定能否以以色列为永久居住地。以色列没有义务接受平均数量的难民。难民能否“返回”以色列, 由以色列行政当局决定。所以, 巴方在日内瓦协议中实质上放弃了其传统上坚持的“返回权”。

《日内瓦协议》虽然是民间人士的和平倡议, 却是双方和平力量台前幕后的角色转换后继续努力的结果, 是双方因非官方身份而排除干扰的成果。尽管《日

内瓦协议》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但无疑为未来巴以双方的正式谈判和难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四、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谈判的主要因素和原则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历时长久,涉及面广,实质是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利益问题。该问题涉及的主要因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 难民问题谈判涉及的主要因素:

¹ 在巴勒斯坦方面,巴勒斯坦难民的大范围分布、长时期的内部分歧和冲突严重削弱了巴方的实力。巴勒斯坦内部的哈马斯等激进派别代表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强硬路线,他们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常常使和平谈判的成果顷刻化为灰烬。巴自治机构和阿拉法特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左右为难,在巴以会谈中举步维艰。继任的阿巴斯也将面临同样问题。

难民问题的谈判涉及每一个难民的切身利益,巴以和谈所确定的“先易后难”的策略引起了难民们的疑虑。例如,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就引发了黎巴嫩、叙利亚等地难民的抗议。在叙利亚,61%的受访者说,中东和平进程会排斥、忽视难民问题;86%的受访者表示要返回自己的家园;52%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不会尊重国际法、联合国决议,甚至不遵守业已签订的协议;65%的受访者认为巴自治机构没有得到代表难民利益谈判的授权。难民们仍然承认巴解是他们的惟一合法代表并负责谈判,但主张难民应该有自己的通过选举和投票产生的代表。^[18]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谈判的同时,如何整合内部、凝聚共识,协调好内部、外部关系,事关谈判的最终成败。

④从以色列方面看,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色列的工党政府接受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同意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谈判基础,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巴拉克政府在谈判中也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但是,以色列内部的反对势力也非常强大。特别是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当政,不会再出现工党政府大幅让步的局面,双方的谈判将更加艰难。但是,以色列要获得永久的和平,必须做出痛苦的最大限度的妥协。

(四)在阿拉伯邻国方面,巴勒斯坦难民大量分布在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等邻国,巴以之间有关难民问题的谈判与他们息息相关。

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统计,到2004年,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有1758274人,占约旦人口总数的60%。^[19]1994年约以和平条约规定,约旦有权参加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谈判。约旦认为,在巴以谈判的议题中,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最为重要。

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有396890人。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黎巴嫩宪法禁止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永久定居。所以,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要优先考虑黎巴嫩的难民。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有417346人。迄今,叙利亚没有参与有关谈判,也没有明确表明立场。

其他阿拉伯国家由于自身实力和利益追求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巴以和谈中立场、态度、作用各不相同,深刻影响着中东和平进程和难民问题的解决。

$\frac{1}{4}$ 美国是最重要的外力因素。以色列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最重要的棋子,美国是以色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伙伴。长期以来,美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一直奉行亲以外交政策,极力使中东地区保持一种美国控制下的、符合美国利益的、有利于以色列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是惟一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影响的外部力量,美国的偏袒政策对公正、和平、持久的解决难民问题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

$\frac{1}{2}$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社会的作用。联合国自始至终就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相联系。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它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决议都成了解决该问题的法律文件。这些决议构成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国际法框架。美国为了主导、控制中东和谈,竭力使联合国作为陪衬。俄国和欧盟等国际力量积极参与有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多边谈判,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谈判原则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变得更加复杂。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会有真正、全面、持久的和平。难民问题迟早要重开谈判。总结多年来巴以谈判的经验教训,双方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客观的现实决定了巴以双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要和平相处,就要通过谈判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巴以冲突数十年所造成的历史积怨、心理隔阂、相互敌视、猜忌乃至仇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烟消云散。巴以双方应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务实地解决问题。

其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协议的达成是双方互相谅解、妥协的结果。这需要双方都尽可能做出

让步, 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 寻求共同的整体利益。双方达成任何协议, 都会遭到内部一些人的反对。必要的妥协和部分牺牲是必然的, 也是必要的。双方应该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 探求双方能够接受的交集部分。

再次, 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巴勒斯坦难民迄今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境况各别, 在短时期内通过一揽子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在涉及难民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轻重缓急、难易主次。首先致力于解决紧迫、容易的方面, 有利于减少谈判的难度, 营造良好的谈判环境。最后, 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难民问题的解决仅仅达成协议是不够的, 还必须付诸于实践, 解决的可能性才转化为可行性。经过谈判达成的谅解和协议不应因为政府更迭而废止。

[注释]

- [1] Jacob Tovv, “Nagotiating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ume x, Number 2, Spring 2003.
- [2] 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 1913—1995 年》[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95 页。
- [3]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 100 年》[M], 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214 页。
- [4] Rex Brynen, “Much Ado about Nothing? The Refugee Working Group and the perils of Multilateral Quasi negotiatio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Nov. 1997.
- [5] John Quigley, “Family Reunion and the Right to Return to Occupied erritory”,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6 (1992), p. 223.
- [6] [以色列] 西蒙·佩雷斯:《新中东》[M], 辛华译, 新华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54 页。
- [7] 到巴拉克为止, 以色列政府已经勉强接受了一定数量的“离乡背井者”(displaced persons, 因 1967 年战争而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 以家庭团聚为名被安置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参见 Tamari, salim, *The future of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s*. Final Statu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April 1996.
- [8] 新华社开罗 9 月 16 日电, 李义昌:《马赞在巴解中委会会议上透露美在戴维营会晤前曾向巴施压》[N], 《参考资料》

2000 年 9 月 20 日。

- [9] The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Ramallah), The Harry S. Trum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Poll # 1 Joint Press Release: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Support the Peace Process and Reconciliation But Are Less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Than Their Leaders,” Survey Research Unit, July 2000.
- [10] “The Clinton Parameters”, December 23rd, 2000. http://www.femep.org/documents/ditorparameters_12_23_00.html.
- [11] “Palestinian Paper on Refugees, ARTICLE XX” Jan. 22, 2001, *Le Monde Diplomatique*, Middle East: the faultline, <http://MondeDiplo.com/focus/mideast/palestinianrefugees200101>
- [12] “Israeli Private Response on Palestinian Refugees, Taba, Jan. 23, 2001,” (Noir paper), *Le Monde Diplomatique*, Middle East; the faultline, <http://MondeDiplo.com/focus/mideast/israeliresponserefugees200101>
- [13] Ari Shavit, “Taba’principle of Return”, *Ha’aretz*, July 7, 2002.
- [14] Yossi Beilin, “What realy happened at Taba”, *Ha’aretz*, July 16, 2002.
- [15] Michael Medved: “Palestinian Claims of ‘Right of Return’ Block all Possible Negotiations”, <http://www.nexusjournal.org/sperate.pdf>
- [16] “The Full Text Geneva Initiative, Preamble.”, <http://www.mideastweb.org/geneval.htm>.
- [17] Menachem Klein: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of the Geneva Accord”,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ume 7, No. 2, August 2004.
- [18] Dr. Hamad Said AlMawel,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Syria: Their Past. Present. Future,” Prepared for the Expert and Advisory Services Fu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June 2000.
- [19]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A/ 59/13, 19 October, 2004, Table: Distribution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下文中黎巴嫩和叙利亚所有的巴勒斯坦难民数据也来自于此。

作者简介: 于卫青, 湛江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博士。(广东湛江, 524048)

收稿日期: 2005-07-26

修改日期: 2005-09-26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A New Approach toward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

by Wu Huaiyou & Cao Xiuning

Neoliberalism came before Globalization in its contemporary sense. The globalization theory of Neoliberalism is a product shaped by Neoliberalists taking advantage of objectiv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changes of world situation. To reve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bear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a)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b) the nature and actual predicament of globalization; c) the worldwid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and for the active promo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model.

7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American Alliance: from “Post Cold War” to “Post September 11”

by Xu Wansheng

Since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the Japanese American alliance has evolved to a new stage, namely, from “post Cold War” to “post September 11”.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American alliance,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traits of the post-September 11 Japanese American alliance and the causes and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liance from the angle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poses some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by China.

12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by Yu Weiqing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nd war between the Arab states and Israel and can only be resolved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 Up to now, the negotiation about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states; the official negoti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 informal negotiation at the unofficial level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 negotiations have brought out th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many-sided factors, and have revealed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 They have also pointed to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order to reach final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Understanding South Korean Diplomacy

by Wang Yiwei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OK's diplomacy has been subjected to a painful choice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ROK is obsessed by the North process of unification; on the other it is bogged down by the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the U. S. South Korean cold war alliance and cannot get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system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March 2005, President Roh Moo-Hyun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ROK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regional balancer”, an attemp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deal-reality” diplomatic dilemma. However, in the face of strong internal reaction and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opinion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e has to change course. Obviously, “regional balancer” is not the appropriate role for South Korea to pla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radiction of ROK's diplomacy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in terms of South Korea — U. S. relations, South Korea's — China relations, South Korea — Japan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The paper holds that ROK's diplomacy swinging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trial of forces of ideal and reality in the fields of securit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